

新闻传播学·新视界译丛
陈卫星◎主编

[英] 安德鲁·查德威克 著
任孟山 译

互联网政治学:

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

Internet Politics

States, Citizens, and 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华夏出版社

新闻传播学·新视界译丛
陈卫星◎主编

互联网政治学： 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

Internet Politics
States, Citizens, and 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英] 安德鲁·查德威克 著
任孟山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 / (英) 查德威克著；任孟山译.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4
(新闻传播学·新视界译丛)

书名原文：Internet Politics: States, Citizens, and 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SBN 978-7-5080-5731-6

I. ①互… II. ①查… ②任… III. ①互联网络-影响-政治 IV. ①D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66780号

**Internet Politics: States, Citizens, and 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by Andrew Chadwick**

Copyright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td. 2006

INTERNET POLITICS: STATES, CITIZENS, AND 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6.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09-7532号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20X1030 1/16开

装订：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张：33.75

版次：2010年4月北京第1版

字数：470千字

印次：201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58.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编委会名单 (按姓名拼音顺序):

- | | |
|-----|-----------------|
| 白 贵 |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
| 陈力丹 |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
| 陈 龙 | 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 |
| 程曼丽 | 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
| 戴元光 | 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 |
| 董天策 |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
| 杜骏飞 |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
| 方晓红 |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
| 郭光华 |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
| 郭镇之 |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
| 胡舒立 |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 |
| 黄 旦 |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
| 黄星民 |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
| 李庆林 | 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
| 李 幸 | 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
| 李 震 | 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
| 刘 昶 |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 |
| 刘利群 |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 |
| 刘卫东 | 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
| 芮必峰 |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
| 单 波 |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
| 单晓红 |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 |
| 谭华孚 | 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
| 田中阳 |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
| 王天定 | 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
| 吴 飞 |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
| 吴予敏 |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 |
| 展 江 |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
| 张 瑾 | 重庆大学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 |
| 张 昆 |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

总 序

理解传播即是理解我们所在的社会和时代：传播的目的是按照社会阶层的变化和现实力量的对比关系来营造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如果把传播视为一种进步力量，视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那么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四个维度的历史进程中，都可以观察到传播的影响。传播在政治权力的确立与合法化的过程中，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中，在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过程中，以多种具体形式——例如平面媒体和电子媒体的信息表现，等等——参与了传统文化秩序的衰落、现代职业伦理的形成与巩固，以及生活价值观的不断更替。很多时候，通过大众媒体展现在大众面前的传播行为，被视为主要的社会影响力。

人类的传播行为历史悠久，从远古时代口耳相传的音调，到自然语言向对象语言的过渡；从甲骨竹简到纸张印刷，再到电子显示屏，都强调了社会主体传播活动的内部反应，或者社会主体间互动反应的关系。没有一个信息能够脱离社会结构，或者脱离信息传播者和信息接受者共处的具体环境。信息的存在方式绝不仅仅是信息本身：信息总是处在传播者和接受者双方的互动关系当中。可以设想，在一个传播行动当中，我们只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提取特定的信息作为我们意识当中的表象，来作为支持自己的信念和观念的依据。

当今的时代是一个世界逐渐平面化的时代，这个平面化的过程是通过经济全球化来完成的。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信息传播技术的全面普及，人类的传播行为几乎与真实时间和虚拟空间形成一种技术上的平行关系。一方面，如何建构社会主体间的关系取决于信息传播的行为效益，信息博弈是传播权力社会化膨胀的表征；另一方面，时空分离的流

动结构同时也产生着身份重叠和身份压缩，信息传播的瞬间效益驱动人类行为的快餐化。当植根于传统的文化性习俗和宗教性理念，越来越趋于成为固守身份的唯一支撑点时，碎片化的现实不断把各种自然和人为的风险推到危机管理的前台。这不仅考验着人们的智慧，也预示着建立新精神平台的希望。

毋庸置疑，传媒的历史性贡献是通过媒介化的表象，形成一种社会关系的组织模式，一种社会的象征再生产的表现。信息需求的增长和社会分化的机制同步，传播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建构了我们思维、感知、经验、记忆和交往的模式。传播之所以成为当代社会的主要整合机制，是由于现代社会的风险变迁导致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快速增加。生产发展带来新的生活秩序、人际关系网络和生活方式，社会提供的丰富产品解构了传统的家庭生活，强化了个人主义和相对主义的信仰，增加了大多数人的依赖性和脆弱性，这些都需要通过向社会寻求信息支持来加以缓解。在传播的公共性得以扩展的同时，传播的利益机制也在形成。

透过人们的新闻传播实践，包括对传播主体、传播行为、传播过程、传播手段和传播效果的考察，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认识和再认识社会关系、实践、话语和制度；重新把握社会整体的系统结构及其相互依赖性；重新认识社会冲突、权力结构和管理模式，等等。对那些重新思考新闻传播的理念在舆论形成、生产实践和社会运行中的功能的人来说，不但相信新闻传播是维持现存社会—经济结构的合法化手段，更要关注社会主体的多元互动如何通过话语建构来推进文化和社会的共同体形成。

今天，信息传播的模式正面临着全球化的挑战。因为，在全球化过程中，活动主体（个体、群体、国家）面临着被重新界定的风险，如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伦理等方面，重新界定意味着结构与解构、排斥与认可、非法与合法、中心化与边缘化、优势与劣势、选择与放弃、转移与接收等二难推理。在这种充满矛盾的现实进程中，信息传播

成为主体选择机制运转的润滑剂，如何在理论和实践上把握信息传播，乃是最终确定这种选择的关键。许多问题都可以从这一视角展开思考：例如，如何定义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的丰富内涵？如何把文化创意纳入信息产业的公共服务体系？如何规避新信息传播技术的社会风险？如何把接近和应用媒介资源当做完善社会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等等。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闻学和传播学在中国成为增长最快的学科和专业之一。形成这种令人鼓舞的局面，显然是因为改革和开放的中国，逐渐成长为一个越来越具有数量规模，同时也越来越具有质量效果的信息源。改革开放首先源于“思想解放”的信息启动，并随着向现代化过渡的社会转型，开始释放中国人不断创新的社会生产力。无论是在社会发展的横截面上，还是在社会建构的纵剖面中，信息的增长和变异终于使中国矗立在现代性和全球化叙事的交叉点上。面对这一机遇，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需要不断开拓视野，更新思维，整合和提炼新的学科信息，作为建构本土学术文化的必要参照和反思对象。

理解传播即是理解我们所在的社会和时代。由此产生的期待，不仅是为满足专业人才的培训，亦是信息传播如何从生产、流通和扩散的层面上满足社会经济条件或政治文化条件的经验期待。这种期待同时也是学科建设的期待：如何让信息传播与人类社会的理想追求趋于一致？如何辨析西方中心主义的方法论误置，从本土的社会现实和文化传统中挖掘出传播的价值和特色？如何避免西方传播思想当中的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不足，从本土社会的动力结构出发？考察传播主体的身份建构？

如果说借助于各种技术手段和内容符号的信息流动，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基础，那么新闻传播的技术可能性和社会扩展性，究竟向我们提出了什么问题，需要思考或重新思考？就方法论的意义而言，这里至少涉及到三个层面的问题：应当关注什么知识的问题，传播理论与经验研究相联系的问题，以及经验对象本身怎样成为理论创新的信息源的问题。

题。编辑出版这套译丛意在提供系列文本，来更新信息储备和扩展思路，同时提供学术借鉴和学术批评的对象。感谢各位译者，因为完成工作的字斟句酌无异于一场跨文化历险；感谢责任编辑；感谢撰写序言的各位学者，不同的专业学术思路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视角；感谢读者，对这些文本的阅读、讨论和批评既是对本土学术文化建设的参与，也是真正的、具有现实意义的传播实践。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

（代译序）

上个月刚刚去世的德国传播学家、政治学家，“沉默的螺旋”理论的创建者，阿伦斯巴赫研究所共同创始人诺埃勒-诺伊曼说过：大众传播通过营造“意见气候”来影响和制约舆论，舆论的形成不是社会公众“理性讨论”的结果，而是“意见气候”的压力作用于人们惧怕孤立的心理，强制人们对“优势意见”采取趋同行动这一非合理过程的产物。由此，我们会顿然领悟：对于追求社会舆论一律的政治而言，为什么掌控新闻媒体是重要的。历史上所有强权政治都是在自觉不自觉地遵行此例：以媒体制舆论，以舆论制民心。由此，我们也会感到更加庆幸：即使不是彻底和永远，互联网至少也已经部分而不可逆地改变了媒体“意见气候”、改变了社会公众和“理性讨论”的定义，改变了国家政治的文化形态，这期间，甚至也包括我们的国家和我们自身。

诺埃尔-诺伊曼生于印刷时代，死于网络时代，我们没有来得及听到她谈及互联网社会生存的舆论法则，但基于她的理论，我们相信：在印刷时代，国家容易形成政府舆论本位、对民众造成沉默的螺旋，而在网络时代，自由出版、匿名发表促使舆论本位分散而不确定，社会对舆论的控制力在与日俱增。

不过，我们也由此遇到了网络政治的第一个问题，当你遭遇网络帝国主义、网络文化霸权时，你会问：基于互联网社会建构的全球化真的有可能是人类的乌托邦吗？早在1969年，学者兼政治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通过分析计算机的融合、远距离信息传播和电视来预测“技术电子革命”影响下的不同集团时，曾经论述道：信息和传播网络的扩张将加快世界同一化的趋势，对信息和文化资源的控制将在定义世界权力方面扮演更为重要的战略性角色，“网络外交”将替代“炮船外交”，

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

世界因此变成“全球社会”。多年后，阿芒·马特拉在《全球联盟的现实政治与乌托邦：对技术全球主义的批判》中回顾布热津斯基这一了不起的预言时，不无敬意却也不无辛辣地评价道：“但是到目前为止，得益于其无所不在的权力，世界上只有美国可被称做‘全球社会’，其中原因在于美国比其他社会拥有更强的信息沟通能力。美国社会将成为一座灯塔，为其他国家照亮前程。用政治学的话来说，它意味着从现在开始，人们无法将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提并论。”

然后，我们遇到了第二个问题，当我们目睹网络民族主义猖獗、网络舆论审判盛行时，你会问：网络时代的人民真的可以从此于幸免不良的社会政治吗？遥想当年，持有保守主义和精英主义立场的古斯塔夫·勒庞在写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时满怀恐惧地说：“我们就要进入的时代，千真万确将是一个群体的时代。”他断定，未来的社会不管根据什么加以组织，都必须考虑到一股新的、“至高无上的”力量，即“群体的力量”。115年后的现在，我的问题是：当这种互联网时代的群体力量是以数值优势呈现时，那些一边倒的网络舆论是否始终有统计学的谬误？如果没有，那么，优势的网络舆论是否可以作为政治或社会理性的存在而受尊重？紧接着的问题是——应该受多大程度的尊重？最后——当它与国家意志抗衡时，我们的人类群体智性将如何选择、如何自处？

这样，我们就回到了更为古老的命题——国家与社会的先验对立，我们也从传播学家及政治学家诺埃勒-诺伊曼回到哲学家洛克、黑格尔和马克思。就（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而言，自由主义者洛克诉求的是“社会外于和高于国家”，国家主义者黑格尔诉求的是“国家高于社会”，而马克思诉求的则是“社会决定国家”。当我们把（公民）社会替换为（网络）社会时，所面对的政治哲学的争议和困扰，似乎并没有因为300年时光的流逝及学术的演进而有所减弱，甚至，我们在面对前所未有的比特世界的政治时，还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的无力和精神的畏惧。

就我而言，这或许是阅读安德鲁·查德威克这部《互联网政治学》

的原初动力。《互联网政治学》的副标题是：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好吧！在当下这个世界上，没有比这几个字眼更为吸引我们，甚至比它们更为触目惊心的概念了，它们如此重要、含混而日新月异，以至于我们深感，有必要聆听一下来自学者的话语。

本书中，查德威克讨论的研究话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互联网本身的政治学，另一类是互联网的政治应用。前者的研究重点在于，梳理了互联网产生与发展过程中的政治因素，以及因互联网生长历史而形成的内部政治，比如：互联网技术演进与融合中的技术格式争论、关键技术政治推动、技术应用程序的最后敲定、现有技术的霸权地位的确定、互联网的全球管理、互联网全球管理中的权力争夺，等等。后者的研究重点则在于，互联网这种技术形态诞生以来的政治化使用，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现实政治的影响，比如：电子民主、电子动员、电子竞选、电子政务、互联网监视、互联网监管与控制、数字鸿沟引发的政治落差、互联网的地缘政治，等等。

就互联网政治学而言，这两类研究基本上涵盖了该学科中包含的所有方面。任何媒介形式的发展，或者说任何新的传播技术的发展，都无法逃脱政治因素的纠缠，更不用说互联网这种新的传播技术本身就是从军事国防领域延展而来，它与国家之间勾连不清的政治性是其与生俱来的秉性之一。只不过，在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由于互联网与言论自由的宪政要素具有天然耦合性，而获得了极其宽阔的发展空间。并且，由于它后来被发觉和发掘出来的政治动员力量，在被草根人士大量使用的同时，也被政治精英作为动员手段和募捐渠道，来进行政治包装和资源聚合。

本书讨论的话题绝大部分以英国和美国的案例作为论据和讨论的对象，这是该书的特色也是其局限所在。虽然其中有些案例超出了英国和美国，但无论数量和数据都逊色很多。不过，这并不影响对互联网政治的研究，一方面是因为英美两国本身就是互联网发达的国家，无论是普及率还是利用度都是如此；另一方面是因为英美两国的社会构成和制度形式所提供的宏观背景，给了互联网更多的政治尝试空间。从这个角度

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

008

讲，这本互联网政治学著作作为当下迅疾发展中的中国互联网提供了一个技术参考和社会参照。但是，就中国互联网社会发育的水平而言，它也只能是参考和参照。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我曾说过：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我国网民的文化结构，1999年以来，大专及以上网民比例已经从86%降至目前的30%左右。70%以上的网民收入在2000元以下，并且其年龄以青年为主，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18—24岁的学生网民群体。我没有谈及的另外一个事实是：在网上把控话语权的活跃发言者往往还并不是网民中最深思熟虑的成员。

但毋庸置疑的是，查德威克书中所提到的互联网的部分政治应用在中国社会已经出现并呈现出深入发展的趋势，比如以政府上网为标志展开的电子政务、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与选民沟通为标志展开的电子民主、以民间力量自发组织开展社会运动为标志展开的电子动员，等等，都是互联网的政治应用中出现的形式，丰富了转型中国的媒介形式和传播方式，为各种社会力量提供了新的参与渠道和博弈空间。五花八门的网络群体事件的产生，正在令人们感受到互联网的技术力量、社会力量和政治能量。由于社会背景和制度架构的独特性，中国正在形成复杂的、本土化互联网政治。这种中国特色的互联网政治，广义而言，是对既往基于父爱主义和全能政府的政治治理的拨正及调整——尽管这种变化从政治制度设计来看有不情愿和被动的意味；狭义而言，是对形形色色的境外网站、境内网站、互联网及新媒体信息流动、网民意见及网络社群的管理政策的理念更迭与多方博弈。其中，特别是越境数据流——点对点的跨越国家政治疆界的数字化电子数据传输，在过去、现在，都引出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国情政治和其他意识形态问题。

传播技术的政治以及传播技术与政治，是所有新的传播技术问世前后都会涉及的问题。而在现代政治社会中，无非将形成两组关系，一个是国家与新传播技术，一个是公民与新传播技术。前者是庙堂之上的云霄，后者是草根之下的土壤。它们之间尽管有此霄壤之别，但却一贯相辅相成，这正是互联网链接式政治生态的奇观之一。当然，两者不仅是平行发展，或者说根本就不是平行发展，而是交叉前进，互相影响。

《互联网政治学》的讨论正是遵循的这种逻辑。但是，我以为这两组关系之上，最核心的元命题仍然是前述所谓国家与社会的先验对立——不管这对立是来自财富、权力，还是来自以比特形式存在的政治意见及社会立场。

关于这一元命题，查德威克在书中这样写道：“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经常性张力会持续引发政治对立。现存政治结构与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之间的联动关系正在形成，就像电子民主与借助互联网力量的底层动员的发展，在使得公民参与的传统形式充满活力。相似的政治化进程正在国际层面上发生，并集中在争论不休的议题上：如何治理与管理互联网？这包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越来越重要的数字鸿沟问题，以及来自于全球恐怖主义网络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无论是现实中的还是想象中的威胁。相较于早些年，政治行为体已经聪明了许多。但是，在最后的分析中可以发现，互联网可不像公民社会中的其他方面那样如此被控制，它的流动与活力本性使得这个问题如此让人着迷。”那么，作为提问者，我们也不妨就从着迷开始，与查德威克一起来思考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网络对立、思考网络时代国家或民族共同体的治理、思考充满流动与活力的网络社会本性。

西方的互联网大国大多属于中产阶级主导的民主社会，在中国，我刚才谈到了中国网民社会的低龄化和低学历性，但有数据显示，中国社会也在迅猛地跨入中产阶级时代，因此可以预期的是，如同现实社会演进的轨迹一样，中国的网络社会迟早也会是中产阶级主导的话语权力格局——我们今天所见到占优势比例的18—24岁的学生网民群体今天正在书写未来中国中产（不管是职业还是学历意义上的）的前传。而即使是在今天，由于资源的优势和意识形态的挤压，中国互联网社会的中产阶级属性已然存在——按照米尔斯的概括，他们是“消费的前卫”和“政治的后卫”的一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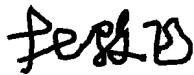
但是，政治的后卫性，从政治学的意义上看，永远不是简单的消极性——特别是当互联网如此改变全球政治版图和人类政治基因的今天。曾经，李普赛特在《政治人》中提出，政治意识形态可以分为左、中、

右三种类型，它们分别代表着劳工阶级、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利益。在不同的政治和历史环境下，每一阶级都会采取一种或是温和或是激进的意识形态。劳工阶级温和的和激进的意识形态分别是社会民主和共产主义，上层阶级的温和的和激进的意识形态分别是保守主义和右翼激进主义，而中产阶级温和的和激进的意识形态则是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我想，关于中产阶级，李普赛特的观察是准确的，唯一的遗憾是准确得有点令人惊悚。从互联网政治学的视角来看，大约没有比自由主义更好的政治生态了，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没有比法西斯主义更坏的政治灾难了。我们很难相信，如此水火交攻的景象、冰炭同炉的可能，即将、甚至已经开始出现在互联网政治的地平线上。

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场白中诗意地写过：“那是最好的时代，那是最坏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我相信：很多年以后，这些话，或许也将是比特世界的后代们回顾互联网早期我们人类的政治走向时，所要说的箴言。

如果未来我们的网络群体生存真的充斥了如此摇摆的、不确定的精神气质，那么，我们就有必要比以往更为专注地思考互联网政治——基于互联网的国家，社会关系，以及人。

是为序。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致 谢

任何一本书都不只是一个人的作品。正是许多学者和机构帮助我逐步达致对互联网政治学的研究，所以我首先要感谢全球各地的众多研究互联网的学者，没有你们，我不可能写成眼前的这本书。

我要特别向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致以感激之情，尤其是比尔·达顿、维多利亚·纳什、斯蒂芬·科尔曼、拉尔夫·施罗德、阿德里安·谢普尔泼德、约翰·泰勒、克里斯·马斯登、米里亚姆·利普斯、德博拉·惠勒、阿瑟·布拉德、詹姆斯·布恩、鲁思·海沃德和琳达·弗兰克兰，在我做客座研究员期间，正是这个机构及其研究人员给予我鼓励和建议、资金和行政支持，才使我得以有必要的时间、空间与智力激发进行本书的创作。

本书中呈现的主题与思想，在以下的几次研讨会中已经有所表述，包括：美国政治学会年会（2001年）；在加拿大国会下议院举行的“加拿大—欧洲议会联盟研讨会”（2002年）；英国政治学研究学会年会（2003年和2005年）；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科学与技术政策部举行的几次研讨会，当时我正在华盛顿从事相关领域的研究（2004年春天）；以及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在2003年至2004年期间举办的几次研讨会。我要向这些会议的参加者表示感谢，虽然他们可能是言者无意，但却直接为这本书提供了建议、鼓励或信息提示，他们是：理查德·艾伦、克里斯蒂娜·贝拉米、迈特·博纳姆、鲁宾·布朗、林肯·达尔伯格、托德·戴维斯、玛丽·弗兰科利、戴伍·加尔森、雷切尔·吉布森、伊丽莎白·高格、奇普·豪斯、理查德·赫弗曼、奥利弗·詹姆斯、史蒂文·肯尼迪、布赖恩·洛德、海伦·马吉茨、克里斯托弗·梅、阿利斯特·米斯克穆恩、特德·纳尔逊、伊莱·诺姆、皮帕·诺里斯、德里克·帕金森、克里斯·佩特森、伯特·罗克曼、艾丽丝·罗宾、肯尼思·罗杰森、李·索尔特、迈克·塞沃德、杰夫·塞弗特、阿米·斯皮内塔、詹姆斯·斯坦叶、汤姆·斯坦伯格、保罗·A. 泰勒、史蒂

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

文·沃德、达雷尔·韦斯特、格雷厄姆·威尔逊、约里克·维尔克斯和史蒂夫·乌尔加。我在美国政治学会华盛顿百年纪念中心做访问学者期间，获益良多。

我真心感谢评议本书初稿方案的七位匿名评审人和评论本书原稿的四位匿名读者。毋庸置疑，他们的工作提升了本书的质量。我要感谢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的本科生、研究生和灵气十足的博士生。

任何一本书的出版，作者与出版人之间的关系都是重要因素，我足够幸运，能与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优秀团队一起合作，这个团队成员包括：纽约的彼得·拉贝拉、肖恩·马奥尼、塞莱斯特·亚历山大和施瓦尼·斯里瓦斯塔瓦，以及牛津的休·登普西。我要特别感谢皮特·拉贝拉，感谢他对这本书的热情、耐心与期望构成的严谨、对严寒的新英格兰冬天表现出的英国式幽默，所有这些极大地促进了我们之间的跨洋合作。

虽然有预言说图书馆将会走向灭亡，但图书馆仍然是学术研究的生活中心——这是本书中所谓“机构调整”的一个好案例。在研究过程中，下述机构的职员给了我很多帮助，这也是任何一本书得以成形的关键因素：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的贝特福德基金会图书馆，伦敦经济学院政治与经济学大英图书馆，以及伦敦大学图书馆。我要特别感谢皇家霍洛威学院的馆际互借部，该部工作人员大大减轻了借书与论文给我带来的负担，还要特别感谢负责与全球电子出版物系统对接的图书馆工作人员，全球电子出版物系统现在已经必不可少。

本书有些部分中使用了“皮尤互联网与美国生活项目”的资料。需要声明的是，我对依据这些资料做出的分析和结论负全责。

互联网政治是一个发展迅速的领域。当下使用的资料会很快过时。幸运的是，当相应的网站更新之后，我可以尽力弥补那些过时的资料。当然，书中的错误或缺点，由我负责。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我要感谢处于我学术研究生活之外的家人与朋友，是他们不停地鼓励我做一份“合格的工作”。

安德鲁·查德威克

目 录

CONTENTS

001	总 序	陈卫星
004	序 言	杜骏飞
010	致 谢	
001	第一章 导论	
019	第一部分 背景	
021	第二章 互联网政治:一些概念工具	
049	第三章 网络逻辑:互联网政治的前历史发展	
065	第四章 互联网的连接、融入和数字鸿沟	
107	第二部分 制 度	
109	第五章 社区、协商和参与——电子民主	
151	第六章 利益集团与社会运动——电子动员	
193	第七章 政党、候选人与选举——电子竞选	
239	第八章 行政部门与管理机构——电子政务	
275	第三部分 问题与争议	
277	第九章 构建全球信息社会	
305	第十章 互联网治理的兴起	
345	第十一章 监视、隐私与安全	
387	第十二章 互联网媒体的政治经济学	
429	第十三章 结论:互联网政治的未来	
444	附录:图、表、例	
447	参考书目	
483	索 引	
523	译者后记	